

中国共产党 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研究

主 编 李君如

东方出版中心

中国共产党 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研究

主 编 李君如
副主编 谢春涛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研究 / 李君如主编.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07. 10

ISBN 978-7-80186-738-4

I. 中… II. 李… III.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研究—1921~2002—文集 IV. D22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34335 号

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研究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 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 刷: 昆山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字 数: 385 千

印 张: 25.25 插页 2

印 数: 1—3 100

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186-738-4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言：在党代会史的研究中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发展的脉络

李君如

2006年7月1日，我应邀参加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学术研讨会”，并在会上提出“党代会研究是党史研究的重要任务”。这篇讲话现已收入本书，作为“代跋”。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谢春涛教授认为我的建议有意义，应该组织大家开展党代会史研究。这样，就由他组织一批青年学者，开始对党的一大到十六大的党代会历史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现在，研究成果出来了，我很高兴。尤其是，这批成果问世的时机很好，恰逢党的十七大即将召开。我强调这一点，并不是要进行“炒作”，而是认为回顾一下我们党的党代会历史，对于我们迎接十七大的胜利召开是很有意义的。

党的十七大，是在我国改革发展关键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决定召开这次大会的建议中指出：“大会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总结党的十六大以来五年的工作，回顾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进程和宝贵经验，对全面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作出战略部署，进一步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从这个决定中，我们不难发现，其主题词就是胡锦涛总书记2007年6月25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班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所

强调的：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正是鉴于这一点，我说回顾一下我们党的党代会历史，对于我们迎接十七大的胜利召开是有意义的。

意义在哪里？读者可以从各个方面去体会和概括。在这里，我只想强调一点：这样的回顾和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在迎接十七大胜利召开乃至今后在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的过程中，深入地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发展过程及其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

有人也许会感到奇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不是源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改革开放吗？怎么还要从党的一大溯源呢？

我们都知道，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着两大历史性课题：一是要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要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也就是要救亡图存、奋发图强。这两大历史性课题，解决前一个课题，才能为解决后一个课题创设条件；反过来，也只有解决了后一个课题，才能真正彻底地避免“落后挨打”的命运，解决好第一个课题。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为解决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前仆后继，英勇奋斗，一直到找到马克思主义，并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结合起来，才使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

1921年7月23日召开的党的一大，宣布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为了解决中华民族面临的第一个历史性课题，中国共产党历尽胜利和失败，进行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的第一次“结合”，以党的七大的胜利召开为标志，实现了第一次理论飞跃，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为解决中华民族面临的第二个历史性课题，中国共产党又历尽胜利和失误，进行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的第二次“结合”，在党的十二大提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开始了第二次理论飞跃，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那么，从党的一大到七大，我们党创立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什么关系呢？我们都知道，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他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出发，找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揭示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必然性。中国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政治的和社会的基础。

更重要的是，在创立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我们党形成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事实上，这正是我们后来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最重要的思想武器。

我们都知道，从八大到十六大，到即将召开的十七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最初的探索，始于毛泽东 1956 年“以苏为鉴”，从中国实际出发，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思考。党的八大是一个重要的标志。但是，后来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失误没有成功，只是给我们留下了大量宝贵的思想遗产。

这一理论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他继承毛泽东的未竟之业和思想财富，恢复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深刻总结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以大无畏的革命胆略和科学精神，领导了改革开放这场新的革命，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的邓小平理论。

伴随着第二次理论飞跃在实践中的深化，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特别是 1992 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以后，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世纪之交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的新要求，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坚持、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出了新的贡献。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新世纪新阶段新的实际出发，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进一步坚持、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尽管现在我们还不能说第二次理论飞跃已经完结，但是从毛泽东最初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到邓小平理论的创立，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到十六大以来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的提出，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已经形成一个科学体系。

因此，我们说，在党代会史的研究中可以生动地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发展的脉络，可以生动地看出在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过程中形成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大以来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等一

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研究

系列重大战略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这三大理论创新成果,贯穿着一个共同的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的主题。

当然,党代会史的研究刚刚起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和理论的研究也需要进一步深化,本书的研究成果只是为大家的研究提供一块“铺路石”。我衷心地希望有更多专业的和业余的研究工作者,能够关心这一研究,投入这一研究。

2007年9月6日夜

于北京昆玉河畔

目 录

序言：在党代会史的研究中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形成发展的脉络 李君如 1

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
二、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23
三、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49
四、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71
五、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96
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127
七、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150
八、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171
九、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204
十、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228
十一、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250
十二、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271
十三、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294
十四、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319
十五、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343
十六、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367

党代会研究是党史研究的重要任务(代跋) 李君如 390

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作始也简，将毕也巨”，历史上很多惊心动魄、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事件刚开始都是不甚引人注目的。“简”者谓之小、弱，而一旦它符合历史趋势、顺应历史潮流，这个初看似乎很微不足道的力量终将掀起历史的巨变，成为历史的主导。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深刻改变了20世纪中国历史的面貌，对世界历史的进程也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其作用可谓“巨”矣，但它向世人宣告自身的成立时，全国仅有50多名党员，出席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10余位，又可谓“简”之极矣。如果说历史有一种逻辑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它真实地呈现在“简”与“巨”之间，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无疑是一种最好的呈现与诠释。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中华民族创造过灿烂的古代文明，但在近代却落后了。而其时，在工业革命的带动下，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强盛起来。为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材料，他们将目标瞄准了资源丰富而又经济落后的中国。他们用武力轰开了闭关自守的中国大门，迫使中国社会不得不顺应他们的意图发生改变。有强权无公理，伴随着中国在一次次军事斗争中的失利，一份份不平等的条约被强加到中国人民的头上。近代中国陷入苦难深重和极度屈辱的深渊中。有学者统计，从鸦片战争至1949年，中国同外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计有745件，其中，从1841年5月至1912年2月的70年间，就签订了411件。^①辉煌的过去同衰败的现实之间形成强烈的对比，中国人除了对这种屈辱感到难堪与无法忍受外，更是痛切地感受到国家已直接面临着被瓜分和灭亡的威胁。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感促使中国的先进分子寻求救亡图存

的道路。1905年,作为革命先行者的孙中山发起成立中国同盟会,完整地提出以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目标的政纲,并努力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这个政纲。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几千年来的君主专制制度,动摇了中国的反动统治秩序,民主共和制度的建立,使人们受到很大的鼓舞。但中华民国的成立并没有给人们带来预期的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进步,原来的幻梦很快又破灭了。旧的路虽然走不通了,但这种痛苦的经历却教育并引导了一些对革命孜孜以求的人,正如林伯渠在回顾自己的思想历程时说:“辛亥革命前觉得只要把帝制推翻便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后经过多少挫折,自己追求的民主还是那样的遥远,于是慢慢的从痛苦经验中,发现了此路不通,终于走上了共产主义道路。这不仅是一个人的经验,在革命队伍里是不缺少这样的人的。”^②

新的出路在哪里?刚开始从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入手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初期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认为伦理问题的解决才是根本的解决,要藉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于是一场指向封建礼教的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迅猛而起,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这场运动的实质仍是以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反对封建阶级的旧文化。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将他们的迷梦粉碎,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矛盾在大战中以极其尖锐的形式暴露出来,曾为中国所尊崇的西方文明价值开始受到怀疑,资本主义制度失去了原有的吸引力。新文化运动左翼人士思想中的这种怀疑,为他们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准备了合宜的土壤。正当中国人民在苦闷中摸索、在黑暗中奋斗的时候,1917年爆发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恰好为他们指明了一条新的道路。

社会主义思想早在清末即传入中国,并在20世纪初形成一股传播热潮,马克思主义学说也曾得到介绍和传播,但那时的理解大都是肤浅的,所以找不到一条通往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十月革命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书本上的学说变成活生生的现实,并且这场革命发生在情况和俄国相同或近似的中国,对中国人民具有特殊的吸引力,有力地推动了先进的中国人倾向于社会主义,同时也推动了他们去认真了解指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当时,社会主义为人类社会必然进至的阶段为大多数人所坚信不疑。时人有言:“这回欧洲大战后的结果,社会主义的潮流,真有万马奔腾之势,睡在鼓里的中国人便也忽然醒觉,睡眠惺忪的不能不跟着一路走。现在社会主义的一句话,

在中国却算是最时髦的名词了。”胡绳曾说：“说起来，那时候的确发生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许多讲资产阶级、讲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人，多多少少都要讲点社会主义”^③，都反映了中国思想界的这种学习榜样的转移。

李大钊是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驱。1918年7月和11月他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等文章，以深邃的历史眼光指出十月革命的胜利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是“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他预言十月革命所掀动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1919年5月，《新青年》出了一期由他主编的《马克思研究专号》。他在这个专号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比较系统、全面的介绍，使马克思主义得到了比较确切的阐明。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是世界社会主义潮流的一部分。初期，由于当时日本正出现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热潮，留日学生和有过留日背景的知识分子担当起了转输马克思主义的任务，杨匏安、李达、施存统等人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大量译介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加拉罕宣言传到中国后，中国人对俄国革命和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关心一下子高涨起来。经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等人的介绍，美国刊物上的布尔什维克文章开始成为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主要的信息来源。有时人概言舆论界宣传社会主义的热情：“近一年来谈社会主义的杂志很多，虽其中也有短命的，但是都似乎有不谈社会主义则不足以称新文化运动的出版物的气概。”^④

当时人们一时还分不清科学社会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无政府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等观点在各种刊物上纷然杂陈，各种学理上相互冲突、彼此龃龉的学说为他们所同时信奉。当译介、鼓吹的高潮过去后，各派之间甚至新文化运动的营垒开始发生明显的分化。先是李大钊与胡适之间发生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后来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同张东荪、梁启超等人发生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接着又对黄凌霜等无政府主义者展开激烈的批判，这些论战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划清科学社会主义与其他派别的社会主义的界限、统一和坚定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信仰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中，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工人阶级伴随着近代工业的出现而逐步成长、发展、壮大起来。独特的生长环境和发展方式，使中

国工人阶级除了具有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优点外,还具有自己特殊的优点:一、他们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受盘剥和压榨的程度更重,因而比别的任何阶级都更具有坚决的彻底的革命性和反抗性,特别需要而且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二、他们相当集中,主要分布在沿海、沿江的大城市,有利于在他们中间传播革命思想,也有利于他们之间的联系和团结,易于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三、他们大多出身于破产的农民或手工业者,与广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有着天然联系,便于在斗争中结成巩固的联盟。

1858年香港工人为反对英法侵略而举行的罢工是有关中国工人运动最早的记载,此后,工人阶级的斗争逐步开展起来,至五四运动的六十年间,中国工人运动经历了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19世纪50年代末到辛亥革命爆发。这个时期工人斗争主要是围绕反对外国殖民主义侵略、反对封建主义压迫以及某些经济目标而展开的,当有限的要求达到后,罢工就中止了,并且罢工斗争的发动和组织上多数是分散、小规模 and 松散的,是对压迫剥削的一种自发反抗和报复。据不完全统计,从1870年到1911年的四十一年间,共发生罢工105起,平均每年2.6起。第二个时期是从辛亥革命胜利到五四运动爆发。这个时期工人阶级的队伍空前壮大,斗争的自觉性逐渐增强,罢工次数激增,规模越来越大也渐具组织性。据不完全统计,这八年共发生罢工144次,平均每年18次。但从总体上看,五四运动前,中国工人运动从斗争的内容到斗争的形式都没有超出自发斗争的阶段。

在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索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作为战胜国的一方,中国竟要被迫接受将德国在中国山东获得的一切特权转交给日本。消息传到国内,引起了全国各界人士的愤怒。5月4日,北京大学、高等师范、中国大学等学校的3000余学生聚集到天安门广场,一场规模空前的反帝爱国运动爆发了。随即,这场运动迅速波及全国,以星火燎原之势燃遍各地。但是北京政府却采取了强力镇压的措施,出动军警逮捕了大批游行的学生。北京政府的蛮横行为激怒了上海工人,出于对爱国学生的同情和支持,上海工人约六七万人自动举行了声援学生的“六五”大罢工,随后,北京、唐山、汉口、南京、长沙等地工人也相继举行罢工,斗争的主力由学生逐渐转向工人。这次大罢工充分显示了上海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和强大威力,表明中国工人阶级已经由自在阶

级逐步转变为自为阶级,工人运动也从经济斗争转向政治斗争,从单一行动发展到联合行动,以独立的力量和主人翁姿态登上政治舞台。后来邓中夏这样说道:“中国工人阶级的政治罢工开始于这一次,后来中国工人阶级能发展自己阶级的独立力量与独立斗争,显然的此次罢工有很大的影响。”^⑤工人阶级表现出来的伟大力量吸引了革命知识分子的注意,他们开始同工人建立联系,去办工人夜校、办工会,向他们作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开始了初步的结合。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同中国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随着中国社会内部出现了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建立新型的工人阶级革命政党的任务被提上了日程。1920年初,有人在报刊上呼吁劳动团体应当自己起来建立一个政党。李大钊等人随即在北京大学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中国最早的一个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当然,中国工人阶级政党的建立,同样与世界社会主义潮流密不可分,得到共产国际的推动与帮助。1919年3月4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成立。1920年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委派维经斯基等人来华,同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维经斯基与李钊、陈独秀等人进行了接触,特别是他与作为“中心人物”的陈独秀接触后,加快了成立共产主义组织的步伐。

1920年7月,上海社会主义者举行会议,商讨建党问题。8月,上海共产党组织正式成立。参加者有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等。首次决议推举陈独秀担任书记,并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陈独秀在征求李大钊的意见后,决定把党定名为共产党。上海共产党组织担负起发起组和联络中心的责任,在建党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1920年10月,在得到陈独秀希望尽快在北京建立党组织的意见后,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1月,北京党组织举行全体会议,决定组织名称定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推举李大钊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罗章龙负责宣传。北京党组织对北方党团组织的建立起到促进作用。北京党组织成立后,受李大钊的委派,陈为人到济南同王尽美、邓恩铭等人接触,帮助建立了济南党组织。武汉建党活动的发起人董必武、陈潭秋、张国恩等人与陈独秀、李汉俊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而且他们已具有建立武汉党组织的思想基础,经过协商后,很快对建党的认识取得一致,于是1920年秋,武汉党组织正式成立。其他地方的

建党活动也迅速开展起来,1921年春,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谭平山、谭植棠等在广州,也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开展共产主义的宣传和组织活动。

中国建党活动的特点是首先出现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较早、产业工人较为集中的中心城市。由于建党活动是在秘密状况下进行的,缺乏经验又没有及时协调,因此早期组织的名称并不统一,活动方式也不尽相同。有称“共产党支部”,有称“共产主义小组”,也有直称“共产党”,后来被习惯地一律称为共产主义小组。至于建党方式,有以开会的方式宣告建党,有以个人秘密联络的方式组党。尽管名称和方式各地不同,然而建党的方向和原则是一致的。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以后,有计划、有组织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到工人中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及其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条件日益成熟。

一大的召开

1921年初,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完成赴华使命即将返回苏联前夕,曾先后与陈独秀、李大钊进行商谈,一致认为中国建党的条件已基本成熟,并商谈过在适当时机召开有各地早期组织代表参加的全国代表会议,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时虽然并未确定举行全国代表大会的具体日期,但酝酿工作实际已经开始。

1921年4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民族殖民地问题委员会书记,化名安德雷森的荷兰籍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动身经由欧洲绕道来华,6月3日到达上海。另一个共产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由北方南下,也于6月到达上海。马林和尼克尔斯基来到上海以后,立即与李达、李汉俊建立了联系。通过交谈,得知上海、北京、济南等大中城市都有党的地方组织,他们建议及早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原本已在酝酿,现又有国际代表的建议,征询陈独秀、李大钊意见后,李达分别写信给各地方组织,通知他们派出代表两名来上海参加全国代表大会,并给每位代表汇出旅费。

各地党组织接到上海发起组的通知后积极响应。接到通知较早的北京党

组织,为选举出席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专门召开了党员会议。在酝酿人选时,大家考虑到党的主要领导人李大钊,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并兼教授和北京八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等职,公务繁忙难以抽身。另外,李大钊当时是社会名流,行动颇引人注意,突然南下诸多不便。因此,没有推选李大钊出席会议。最后,会议确定张国焘、刘仁静作为代表。由于当时党处于秘密状态,初创时期又无统一的规章和严格的组织制度,再加上各地区的政治环境和活动特点都不一样。因此,各地确定和产生代表的方式也有所不同,有的是召开党员会选举,有的是以发起人为当然代表秘密前往,也有的由领导人指定人员出席。陈独秀当时出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有急务在身,不能亲自到沪主持,就委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个人出席会议。虽然他不能出席,但他向大会提交了一封信并提出四条意见要求与会代表予以注意:一是培植党员;二是民权主义之指导;三是纪纲;四是慎重进行争取群众政权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对会议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出席一大的代表共计有13人: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张国焘、刘仁静、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陈公博、包惠僧、周佛海。他们分别代表七个地方:长沙、武汉、北京、济南、上海、广州和日本。代表中年龄最大的何叔衡45岁,最小的刘仁静19岁,平均年龄是毛泽东的28岁。按原籍,湖北籍有五人,湖南籍有四人。

大会原计划于6月20日召开,但各地代表7月23日才全部陆续到达。这些代表中,原本在沪的有李达、李汉俊。张国焘、王尽美、邓恩铭于7月1日前到达上海。大多数代表是7月2日以后到达上海的。

据谢觉哉日记,毛泽东、何叔衡于6月29日下午乘轮船从长沙动身赴沪。由于当时从长沙到上海没有直达的车船,必须先从长沙到武汉,再从武汉乘船到上海,若途中不停留,也需五天左右的时间。由此可推算毛泽东、何叔衡到达上海的时间是7月4日以后。到达上海后,因距实际开会时间尚早,毛泽东曾去南京、杭州一带游历。

据刘仁静本人回忆,他与邓中夏、黄日葵等人一起于6月下旬从北京动身南下,7月初抵达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年会。因为年会7月4日结束,他在年会结束后还在南京停留了两三天,后才以“留沪习德文”为借口赴沪;故刘仁静应是在7月7日左右到达上海。

一大结束后不久,陈公博写了一篇文章《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刊载在《新青年》上。该文中说他是7月14日启程赴沪。又据他是7月31日离沪赴杭,在上海只住了十天,所以他应是7月21日抵达上海。

周佛海当时在日本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读书,据《少年中国》的“会员消息”以及他本人的回忆,他是在暑假中从日本动身回国。一般开始放暑假是在7月,而邮件和旅途都需要比在国内更长的时间,故可推算周佛海是7月下旬抵达上海。

据包惠僧回忆,陈独秀指定由他和陈公博出席会议,但他比陈公博晚出发一天,是7月15日乘船直赴上海,大约20日到达。据他说,董必武、陈潭秋抵达上海的时间和他不相上下,那么,董必武与陈潭秋抵达上海的时间也应是20日左右。

当时留下了一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文献,似当事人在一大闭幕后不久所写,文中有如下记载:“代表大会预定6月20日召开,但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各地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全部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⑥

为什么现在将7月1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纪念日?这种说法是毛泽东1938年5月首先提出来的。当时,在延安的一大出席者只有毛泽东、董必武两人,他们记得一大是1921年7月召开的,但记不清确切的日期,又无档案资料可查,于是就把7月的第一天作为象征性的中国共产党诞辰纪念日。毛泽东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讲演《论持久战》时提出:“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十七周年纪念日,这个日子,又正当抗战的一周年。”毛泽东当时是把“七一”作为党的诞辰纪念日提出来的,并没有说这是一大召开的确切日期。中央正式文件中将“七一”作为党的生日,是1941年6月30日中央发出的《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廿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文件提出:“今年‘七一’是中共产生的二十周年,‘七七’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四周年,各抗日根据地应分别召集会议,采取各种办法,举行纪念,并在各种刊物出特刊或特辑。”这是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作出的关于纪念“七一”的第一个指示。此后,“七一”成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例行节日。

由于隐蔽和保密的需要,一大的会址和代表们的住所都没有安排在旅社、饭店。会址定在李汉俊的哥哥、老同盟会员并曾任北京政府陆军总长李书城

的寓所,住处也就近解决。李达的夫人王会悟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与博文女校的校长黄兆兰相识,博文女校距离开会地点较近,行动方便,加上正值暑假,教师和学生都已离校,代表们住在此处便于保密,于是王会悟以北京大学师生来沪交流学术的名义租借了房子。各地代表全部到达上海后,除了陈公博带着新婚夫人住在大东旅社外,其余都住在博文女校内。各地代表全部到齐后,在博文女校内开了一次简短的预备会。一致认为党的代表大会已经准备就绪,应立即举行。

1921年7月23日晚8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后称望志路106号)正式开幕。列席会议的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克尔斯基。会议在一幢砖木结构的两层小楼里举行,客堂中间摆着一张大餐桌,代表们围坐四周。室内没有特别的布置,陈设简单,气氛庄重。

会上,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先后热情致词。由李汉俊、刘仁静随即翻译。马林首先发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共产国际增添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增添了一个东方战友,希望中国同志努力工作,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作出自己的应有贡献。他还介绍了共产国际的概况,以及他本人在爪哇建党活动的经验,并提出中国党的成员目前大多是知识分子,工人成分太少,建议特别注意发展工人运动,把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尼克尔斯基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表示祝贺,并介绍了赤色职工国际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情况,建议中国党将代表大会的进程及时报告给远东局。代表们在会上具体讨论了大会的议程和任务,一致决定先由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各地区的工作,然后讨论和通过党的纲领;制订今后实际工作计划,选举党的中央领导机构。

7月24日,代表大会举行第二次会议,由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本地党团组织发展的情况。

7月25、26日,休会两天,用于起草会议文件。代表大会召开以前,虽然进行了一些酝酿和准备,但由于人员分散,时间仓促,未能事先起草供代表们讨论的会议文件。根据马林的建议,决定由张国焘、董必武、李达等人组成起草委员会,用两天时间起草党的纲领和今后实际工作计划。经过两天的紧张工作,起草委员会拿出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初稿,供到会代表讨论。